



陈漱渝

許廣平的一生

天津人民出版社

许广平

许 广 平 的 一 生

陈漱渝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10525

天津人民出版社

810525

许广平的一生

陈漱渝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7 3/8 插页 5 字数 150,000

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450

统一书号：11072·79

定 价：0.51 元

序

距今四十五年之前，我在上海，有一次，郁达夫先生和我谈起传记文学。他说传记文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不说别的，翻开一部《史记》，不论是《项羽本纪》、《留侯世家》，还是《孟尝君列传》，就都是出色的传记文学。只是这个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时至今日，反而看不到一部内容结实的作品，却让肤浅的《文人画像》、《文坛印象记》之类，充斥书市，取正规的传记文学而代之了。

达夫先生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当时的情形确实象这位老作家所说。不幸的是，光阴如白驹过隙，几十年匆匆逝去，传记文学依旧是学术方面薄弱的一环。直到最近几年，受到西方出版界的影响，才算有人注意，出了几种关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人物的传记，勉强填补了空白。自然，我们至今还是没有写过《雪莱传》、《拜伦传》和《服尔德传》那样作品的莫罗珂(Andre Maurois)，也没有写过《莎士比亚传》、《王尔德传》和《萧伯纳传》那样作品的赫理斯(Frank Harris)，更不用说写过《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了。这些传记作家以敏锐的触觉伸入伟大的心灵，“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象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斯大林传》那样，他们各各写出了一个情绪的世界，一个精神和道德的世界，一个绚丽多彩的充满艺术创造的世界。——通过对象的不同的经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就我们国内而言，的确，传记文学还只是开始，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每个传记文学作者对于自己的人物，无论写的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都需有比较详尽细致的了解，特别是对人物的性格和气质的了解。因此，我们不但要向外国已有定评的传记文学作品学习，更重要的是，还得从祖国古典名著中吸取历史的营养——这种历史的营养，是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民族习气和生活情愫的体现，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表或顶替。

不过在目前，要认真吸取这样的营养，尚非易易。

和上述的历史的营养不同，传记文学本身含有一般的历史的因素，又含有一般的文学作品的因素；但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作品。现有的写得较好的传记，大抵能把握对象，运用历史和文学的特点，施展手法，别出心裁，真实地赋予自己的人物以生命。人物在纸上活了，这就意味着，一部好的文学传记诞生了。

我读过一些这样的传记，却总觉得还缺少一点什么，使人不能完全惬意和满意。人物没有足够的历史的营养。人们知道，文学传记里的人物和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不一样，如果活动在文学传记里的人物显得干瘪，面黄肌瘦，有气无力，我以为往往不是由于作者生活单薄、手头掌握的材料不足，而是他本身吸收的历史的营养太少，没有力量将长期以来沁

入人物心底的民族习气和生活情愫开掘出来，使人物更为丰腴，更有情趣，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更能符合于历史的真实的细节；如果写的是政治或者文化方面重要的人物，这种营养对我们说来尤其是不可或缺了。

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文化上，景宋（许广平）先生都不是一个叱咤一世、气盖山河的人物，漱渝同志看来也无意将她写成这模样。自然，作为一部反映时代眉目的传记，主角有她自己的事业，有她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一个女战士或者一个妇女运动家，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人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笔触又常常偏到另一方面，例如“同行者”、“十年携手共艰危”、“她活在鲁迅的事业中”等等，抒写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另一种形象了。——虽然她仍然是一个许广平，一个不折不扣的许广平。

漱渝同志是研究鲁迅的，他这样来写景宋先生，完全在意料之中，我想，这或者倒不失为驾轻就熟，实事求是之一途吧。

唐 强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于北京。

写在前面

今年七、八月间，鲁迅研究室的陈漱渝同志以有关史料为依据，写成了这本《许广平的一生》，持来征求我的意见，并恳切地要求我作一序言。我犹疑了一个多月，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我担心以家属的身份来写这篇序言，可能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担心有人还会把书中的一些观点当成“受许广平家属影响”的结果，这于作者反无好处。但陈漱渝同志以为不必顾忌太多，坚持让我在前面写几句话。我推辞不了，只好勉为从命。

我觉得，我的母亲并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伟人，而只是一名普通、平凡的中国妇女，但由于她在青年时代就被五四运动的号角唤醒，较早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洪流，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名战士，所以如实地把她的一生记录下来，也许可以反映出大时代的一个侧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无数值得后人景仰的杰出女性。她们如同闪烁的群星，装点着我们祖国灿烂的星空。母亲生前说过：“凡是为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过力量的战斗者，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党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我坚信，凡是尽其所能为人民做过大大小小贡献的人们，历史的天平都将对他们作出公正的评价。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对母亲的了解，是从我懂事之后才开始的，而且往往是从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地体会

她的为人，因此我对母亲的认识，必然会受到我个人水平和视野的局限。我所谈的内容，只能供希望更多地了解我母亲的读者们参考，并不是作为对我母亲的定评。

我深切感到，我母亲身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她的牺牲精神。我母亲在求学期间，以“笨鸟先飞”的毅力刻苦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在五四运动和女师大学生运动中，她更是勇于冲锋陷阵。以能力和才华而论，她毕业之后是有条件独立作出一番事业的。然而母亲目睹父亲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斗争中所遭遇的重重困难，便毅然牺牲自己全力帮助我的父亲。她清晰地看到，当好我父亲的助手，比她独立服务于社会将对祖国和人民更为有利。父亲在跟母亲共同生活的十年中，在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竟超过了此前的二十年，这就是对我母亲自我牺牲所作出的巨大报偿。如果没有母亲的精心照顾和协同作战，父亲就不可能做这么多的工作，甚至可能会更早地被死神夺去生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父亲在赠给母亲的《芥子园画谱》三集首册内，题写了一首现已脍炙人口的七绝：“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首诗，不仅抒发了父母亲艰难与共、苦乐相知的深厚情谊，而且也是父亲对母亲所作的高度评价，说明他们不仅是生活上的爱侣，而且也是携手同行的战友。有人为我母亲在家庭生活中所作的牺牲而感到惋惜，我认为是不必要的。

母亲的牺牲精神，不仅表现在处理跟我父亲的关系方面，而且在革命斗争中也闪耀出了熠熠光华。父亲去世之后，她积极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当上海租界被

日军占领之后，在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中她第一个被捕，并遭到了日本宪兵的毒刑拷打。在生死关头，她坚守的信条就是“牺牲自己，保全同志；牺牲个人，保全团体。”这种崇高的牺牲精神，支持她战胜了人间少有的磨难。黔驴技穷的敌人始终未能从她口中逼出任何一点地下抗日力量的情况。郑振铎同志称她为“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就是对她这种牺牲精神所作的褒奖。

在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上，母亲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极为感人的。由于一生饱经忧患，母亲晚年患有二度心衰。当她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时，曾事先留下了一份遗嘱，要求把自己的尸体“供医学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母亲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早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就谈到愿将尸体“供医学上解剖，冀于世不无小补”。母亲的这种牺牲精神，对于在处理丧事问题上破旧俗、开新风，也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母亲去世之后，我们按照她的遗嘱，将她的遗体火化，把骨灰撒在土地上，实现了她再三嘱咐的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母亲在她七十年的生涯中，从事了多方面的活动。她的最为人们熟知的贡献，是保存鲁迅文化遗产、宣传鲁迅光辉业绩。

母亲生前不知跟我说过多少次：“海婴，你要知道，我作为一个女人，在你爸爸死后挣扎着生活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那时，许家把她跟父亲的自由结合视为叛逆，因而断绝了跟她的联系；周作人不承认她跟父亲的婚姻关系，反

而薄待我的祖母、私售我父亲的藏书，间接给母亲施加压力。至於母亲在敌伪横行的上海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更是难以尽述。在这种艰难险恶的处境中，支持母亲顽强生活下来的精神支柱，就是保存鲁迅遗物。她坚信暗夜必将消逝，曙光即将显露。在“天亮”之后，她要把鲁迅为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人民。解放之后，母亲的这一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母亲认为，鲁迅的稿酬，应当主要用在纪念鲁迅的事业方面。早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友人从重庆返沪，支付给母亲一笔当地书店出版鲁迅作品的版税。母亲便用这笔钱重修了她亲自设计的位于上海万国公墓的鲁迅墓地。一九四八年冬，母亲初到东北解放区，当地书店也曾用纸币支付了一笔鲁迅作品版税。母亲了解到这些书店是党支持开办的，便让我将这些纸币兑换成金条，全部捐赠给东北鲁艺。一九五〇年，苏北发生水灾，母亲又把积攒下来的稿费两亿元（折合现在两万元人民币）献出来作为灾民寒衣捐。筹办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时，母亲无偿捐赠了鲁迅上海故居和北京故居的全部遗物。有些东西本来是可以留作自用的，比如上海故居的缝纫机和一些家具、药品等，但为了保存故居原貌，母亲一件都没有保留，举家北迁之后才用自己的工资重新购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又如陈师曾馈赠父亲的亲笔画，现在已成为稀世之宝，本来留下几帧作为纪念亦无可，但母亲也未据为私有。为了使鲁迅著作能以较低售价供读者购置，母亲又断然将鲁迅著作的出版权和全部版税上交国家出版部门，自己未取分文。就连母亲本人的一些未刊

稿和与鲁迅研究有关的信札，她也捐献给了有关部门。母亲去世之后，我们多次清理她的遗物，除了找到一些照片、剪报和母亲已刊文章的原稿之外，几乎再没有其他东西了。近年来，我有机会三次赴日访问，接触到一些日本友人，他们对鲁迅的一纸一墨都十分热爱。当我用鲁迅印章盖成印谱作为纪念品送给他们时，他们非常感谢，视为珍宝。还有一位日本朋友说：“我知道鲁迅的手迹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如能得到，我甘愿倾家荡产。”这位日本友人的话虽然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却真挚地表达了世界人民尊崇鲁迅的友好感情，同时也说明母亲捐赠的遗物其价值是难以用金钱估量的。

最后，我还想谈谈母亲对党的感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母亲对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戮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中，母亲却跟父亲一道，勇敢而坚定地站到了跟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战线，而将感情倾注于在血泊中苦斗的中国共产党。母亲在组织上入党是在一九六〇年，但她很早就表达了入党的强烈愿望。党当时认为，母亲暂时不入党，将更便于她在民主党派工作。母亲愉快地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并通过学习不断体会党对一个革命者的要求，努力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和党的纪律要求自己。一九六〇年，母亲再次提出了入党的请求，终于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批准。母亲在革命处于低潮的一九二七年开始站在党的一边，又在“寒流滚滚”“万花纷谢”的一九六〇年正式加入党的组织，这三十多年的历程，就是她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追求光明进步、认真进行自我改造的历程。

母亲死于林彪、“四人帮”猖獗一时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导致她心脏病猝发的原因是江青指使戚本禹盗取鲁迅手稿的严重政治事件。

“文化大革命”前，鲁迅书信手稿主要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为了征集、保存、出版这批书信，我的母亲和很多鲁迅生前友好付出了极大努力、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曲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原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通过北京市委、北京市文化局文革小组和鲁迅博物馆工作组，将鲁迅博物馆保存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以及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十五页手稿一齐调走，存文化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人帮”与林彪相勾结，在全国范围制造混乱，妄图进行反革命夺权。江青利用这一时机，指使戚本禹用中央文革的名义从文化部盗走了这批手稿。当时我们毫无所知。事后，鲁迅博物馆多次向我母亲反映这一情况。为了查实鲁迅手稿的下落，鲁迅博物馆曾经分别函询中央文革和戚本禹，均渺无回音。

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的反革命原形败露。我母亲担心这批手稿遭到破坏，十分焦虑。同年二月十七日，鲁迅博物馆革命大联合勤务组再次写信给中央文革，要求追查这批手稿的下落，并请我母亲转交此信。三月二日，我母亲决定给中央写信，信的大意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十五页，书信手稿一〇五四封一五二四页（大部未印），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文化部从博物馆调走。一九六七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批手稿拿走。现在我不知这些手稿究竟落于

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佚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

这是我母亲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口授完毕。三月三日上午由于深受刺激，心脏病急性发作，不幸逝世。这封信，表达了母亲对“四人帮”及其同伙破坏鲁迅文化遗产的深切忧虑。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战斗！后来，当周恩来同志亲赴北京医院跟我母亲的遗体告别时，我亲自将此信面呈他老人家，并请转呈党中央。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终于从江青保密室的保险柜中找出了这批手稿。令人痛心的是，母亲已不能再亲眼看到她拼出最后一腔热血保存的这批珍贵革命文物了。

不无遗憾的是，在“四人帮”对我母亲威胁恐吓，盗去书信手稿，以至使我母亲因抢救不及忧愤而死的多年之后，竟有人毫无根据地散布：“戚本禹的汽车经常停在许广平的门前。戚的阴谋败露，许广平心里害怕。她不是气死的，而是急死的。”我觉得，散布这种新时代的流言，恐怕也是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的。

母亲临终前，曾多次问我：“海婴，你看我的一生，是否对得起党，是否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我想，母亲用她自己的言行，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我谨以上面这些话，放在陈漱渝同志这本书的前面，以寄托我对母亲的哀思。在全国人民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并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开始了伟大进军的今天，愿母亲的英魂含笑于九泉。

周 海 婴

于八〇年九月廿五日鲁迅诞辰九十九年



许 广 平 同 志 像



许广平在上海

虹口公园鲁迅墓前

许广平参加外事活动时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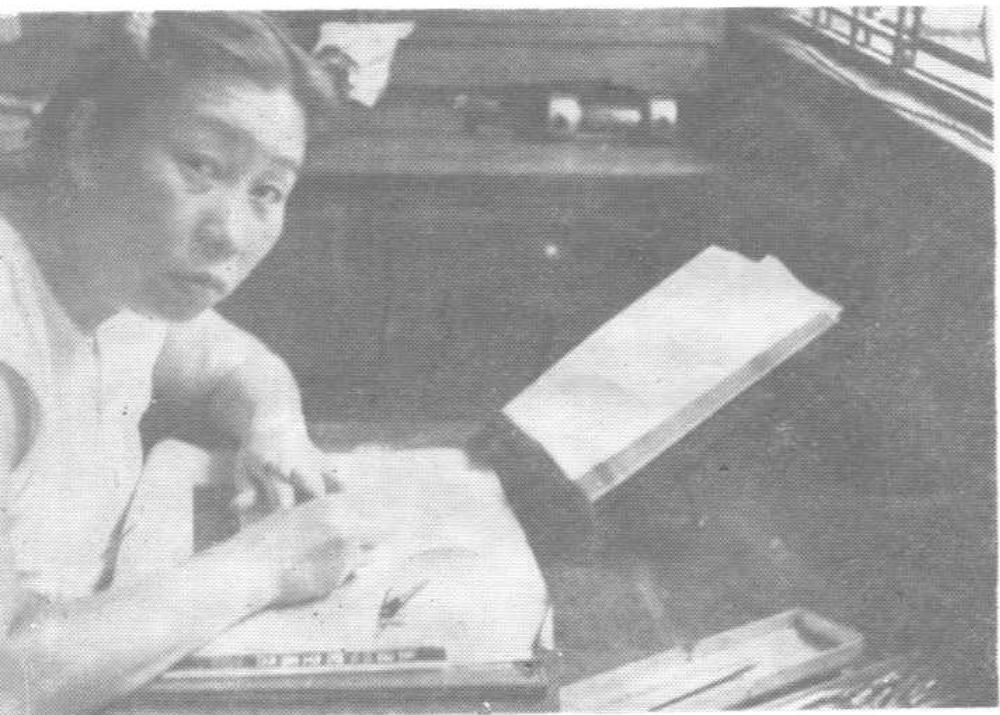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许广平全家合影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许广平、斯特朗、陈毅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



一九四四年许广平复写抄存《鲁迅日记》